

老谭
著

水浒 一直被 误读

《水浒》究竟是一本好书还是坏书？

水泊梁山是农民起义还是强盗结群？
李逵、武松等人是古之侠客，还是杀人狂魔？



重庆大学出版社



《水浒》一直被误读

SHUIHU YIZHIBEIWUDU

老谭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一直被误读/老谭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624-5377-2

I. ①水… II. ①老… III. ①《水浒》研究 IV.
①1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6943号

《水浒》一直被误读

老谭 著 插图(明)陈洪绶

策划:重庆九月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王伦航 版式设计:周娟 尹恒

责任校对:吴文静 责任印制: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75 字数:278千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377-2 定价:24.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引言

“三国热”甫退，“水浒热”渐生。

“热”——“热”是好事。一部古典小说，流传四百多年，迄今依然有不少人品读、不少人评说，不仅证明了它确实具备艺术生命力，而且显示出它还蕴蓄着与后来者相贯通的人文信息。且不论是否都要“古为今用”，起码可以“古为今鉴”，那就颇有历时性的普泛价值了。

不少人品读，不少人评说，不求“舆论一律”，尤其难能可贵。

《水浒》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古典小说？一百单八将“聚义”水泊梁山，是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还是土匪强盗结群杀人放火，抑或别的什么？由“聚义厅”到“忠义堂”，“义”的涵蕴何在？林冲等确是“逼上梁山”，但更多的人却是“避上梁山”、“赚上梁山”、“伙上梁山”，五花八门如何疏解？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人杀人甚多，对他们该如何评价？宋江作为梁山领导集团的“核心”，头上拥有的传统文化道德美誉之多无人能及，但对他的评价历来毁誉纷呈，原因何在？潘金莲俨若“四大淫妇”头号代表，对她以及相关女性应该怎么看？毛泽东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撇开特定的政治影射，到底有没有一定道理？诸如此类的问题众说纷纭，真正实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才能让《水浒》更加贴近世道人心。

我今“另眼看《水浒》”，就是凑“热闹”，主动参与其间。我希图表达的，都只是个人所得所悟，不管与他人同为异。我厌恶“定于一尊”，当然

就不会妄图一己之见“定于一尊”。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向有“文备众体”之说，说的是主体叙述之间，还掺入了诗词歌赋等多种文学形式。《水浒》里的诗，数量之多和品质之高比不过《红楼梦》，但行文中的若干夹评诗，乃至为个别人物代拟的一二“言志诗”，还是颇耐人寻味的。我从其间选取出一些诗句，一句诗作为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统领一个章节，共计二十个章节展开随笔似的评说。这一点，在结构形式上，当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在思想内容上，我这本书也有特点。所有二十章评说，重在《水浒》里的人和事，但又绝不受其拘囿。每一章都由点到面，横扩纵连，信马由缰，不拘一格。合起来，是评说《水浒》而又不止是评说《水浒》，扩张到了历史、社会、人生、艺术。但无论怎样扩张，关注的焦点始终在于：中华民族“侠文化”，中华国家“国民性”。“另眼”的“另”，多在于斯。

2009年3月15日于重庆淡水轩

目 录

天罡地煞 出泉台

001

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们不是在革命、在起义，而是聚众造反。梁山核心领导集团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由“暂居水泊”而“专待招安”，尤其表明他们的聚众造反并不代表农民利益。连农民造反都说不上，就注定了《水浒》绝不是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或者表现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硬给贴上的相关标签可以休矣。

《水浒》所写的聚众造反，所“聚”之“众”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社会阶级，而是一群“布衣之侠”。他们在自己所认之“义”的旗号下，由散到聚，由个人见义勇为到集体仗义行侠，演绎出了一部张扬“侠义”精神的历史活剧。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把《水浒》视为一部赞美“侠义”精神的古典小说或者干脆界定为一部“侠义小说”。

水浒寨中 屯节侠

015

知己相逢 义断金

029

《水浒》既然着力写“义侠”，品评梁山一百单八将就应当以“义侠”作为标准。毫无疑问，鲁智深是《水浒》里的第一义侠。他那样心地厚实，大气磅礴，重情重义，敢作敢当，所作所为几近全面地体现出了历朝历代的“义侠”品格，尤其是“侠”的“利他性”最为突出，连杀人放火也比武松（更不要说李逵）显得有分寸，遍《水浒》无人能及。

评林冲，怎一个“狠”字了得？他与鲁智深同样重情重义，敢作敢当，但大同之间又有大异。主要的大异在于，林冲更显得智勇兼备，能屈能伸，讲究有理有节，随机用忍用狠，其能虽显而不矜，其德虽彰而不伐。较之先秦“义侠”，林冲兼有鲁仲连、蔺相如和聂政、荆轲的某些影子，而这些影子都融汇于“小张飞”当中。

真是魁奇 伟丈夫

043

未同豪气 岂相求

060

作为梁山先后三个领头人的第一个，王伦以其不顾“大义”，嫉贤妒能，犹如一个“反面教员”，充分映衬、烘托了晁盖，特别是映衬、烘托了宋江。不能笃信“江湖侠义”，不能力行“江湖侠义”，就要惨遭淘汰，再也当不成梁山的“核心”。这样的一名“反面教员”，越千百年置诸当今乃至今后，依然还具有十分深长的警世价值。

“智取生辰纲”引发的结果是“争斗冤仇”殊途同归，也像林冲那样上山“落草”了。但晁盖等人和杨志都是“避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与之类似者约占37.1%，而与林冲类似的“逼上梁山”者只占7.4%。此外还有“赚上梁山”者占19.4%，“伙上梁山”者占36.1%，一起造成了一百单八将组合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导致由聚众造反走向接受“招安”。

英雄聚会
本无期

072

帮闲得志
一高俅

085

《水浒》写高俅，最大成功就在于写活了他的“帮闲得志”以及这种“帮闲得志”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危害性。他与其“帮”的主子赵佶都是“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个出自江湖，一个生在庙堂，臭味相投方造成了“帮闲得志”。说先写高俅体现出了“乱自上作”，切不宜迷信前人陈说，专顾高俅一人，而放过了“远”之太尉洪信、“上”之徽宗赵佶。

贪官、滥官遍于《水浒》，如果让李逵“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确会有无辜枉死的冤鬼在内；但若让李逵只是隔一个砍一个，罪不容诛的漏网之“鱼”势必更多。成体制的贪官、滥官不断地残民以逞，“剥民”之烈实在“过于贼”，所以民众才不得不“聚义”造反。如果讲“逼上梁山”，这种体制性的“剥民”，当是比高俅一伙迫害林冲更为本质的“逼”。

剥民官府
过于贼

099

奉天法网
有时开

115

宋江在《水浒》里一出场亮相，便以“私放晁盖”彰显出他是梁山顶级“义侠”或者“义侠”领袖。为着“心腹兄弟”晁盖的吉凶安危，纵然触犯“法网”，“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毅然决然地要去通风报信，就是一种典型的“侠义”行为。宋江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朱仝与他一样“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就与《史记·游侠列传》赞誉的朱家同属一脉。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是仅占总数8.3%的贫苦农民的三个代表，比解珍、解宝更具典型性。让阮氏兄弟唱出“忠心报答赵官家”，纯粹是给《水浒》套上“忠义”桂冠的旧文人所强加的，与他们不相干。但阮氏兄弟参与劫取“生辰纲”，参与梁山聚众造反，乃至后来阮小七“偷御酒”、“穿御服”，都是图“快活”，也与“革命”之类时髦概念不相干。

忠心报答
赵官家

128

钢刀响处 人头滚

145

冷静、冷峻、冷酷，武松无疑是《水浒》第一“冷面杀手”，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义侠”。他特别重情重义，知恩报恩，但“义”的出发点多在“我”，多以“他”对“我”如何作为是非标准和行为依据，因而更是侠的“唯我性”的突出代表。他还具有“嗜杀”的劣根遗风，这种“嗜杀性”，既是“侠文化”的一个负面基因，又是“国民性”的一个负面基因，需要从实加以鉴别。

企图乱伦，婚外偷情，毒杀亲夫，潘金莲俨然是《水浒》“四大淫妇”之首。但在她的“淫”和“毒”的深层，社会历史、个性特征、女性心理诸多因素复合交构，又使她在本质上属于浸透礼教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性爱畸形产物，既是个体施害者，更是体制受害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代文明社会似可以给她一点理解和宽容。

淫妇偏思 并蒂莲

159

快活林中 重快活

173

从施恩到张顺，《水浒》写了一大群“侠”。写这一大群“侠”，从结构方式上看有别于先前的“鲁十回”、“林十回”、“武十回”着重写“侠”的个人，而是过渡到了穿插在“宋十回”中交叉写“侠”的群体；从社会内容上看，更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侠”群体的社会构成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以及“侠”成员的品质、行为多样性和可变性。对凸显宋江，也十分关键。

宋江是《水浒》编著者刻意塑造的“忠义”代言人。他“于家大孝”，“于国大忠”，注定了不会有黄巢那种“凌云志”，因而他决然“吟”不出“敢笑黄巢不丈夫”那样的“反诗”。他力主“招安”，力求“招安”，终致把他自己和绝大多数梁山兄弟引上了不归路，但从社会历史看，这种“侠义”行为又有它的或然性和合理性，不宜简单否定。

敢笑黄巢 不丈夫

187

李逵猛恶 无人敌

204

在宋江的四大铁哥们儿中，李逵是铁得特殊的唯一一个。他粗鲁横霸，其间既有“游民无产者”式的无知无畏，淳朴浑莽，又有官场皂隶的估吃霸欺，仗势欺人，以“嗜杀”为“快活”尤其堪称“梁山之冠”。但他确有不少的性格优点，自发的“革命性”也当数“梁山第一”，只不过在宋大哥“替天行道”、接受“招安”的“思想”引导下，些许“革命性”只能与生命同混于悲剧结局。

宋江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在总体情节上，既是由个体侠义生涯为主向群体聚义造反为主转进的关节所在，又是由一般的聚义造反向特殊的“替天行道”转变的缘起所在。在个体形象上，也规定了宋江是梁山的“天命核心”。但“忠义”仍然从属于“侠义”，《水浒》当是一部反映北宋末年一批“布衣之侠”的侠义生涯、聚义过程、造反经历、归顺选择和悲剧结局的“侠义小说”。

替天行道 动天兵

219

事情言语 费参详

238

“赚”有一个引申义，即欺骗。被“赚”上梁山的梁山好汉约占五分之一，“赚”的主要两手一是“绝归路”，二是“讲忠义”，前者以秦明、李应、朱仝、卢俊义为代表，后者以呼延灼、徐宁、关胜、索超最典型。“赚”上梁山的朝廷军官越多，加上先前就有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乃至“三教九流”人物，梁山一百单八将的社会成分就越多样化和复杂化，“招安”因之成为主导选择。

与“四大淫妇”对应，《水浒》写出了两组男性人物：一组为宋江、武松、杨雄和卢俊义，另一组为张文远、西门庆、裴如海和李固。经“四大淫妇”和“四大奸夫”陪衬，由“四大好汉”反映出了一种特殊的“侠义”精神，亦即所谓“不亲女色丈夫身”。寄寓于其中的“女性观”可取处固然不多，“侠义观”可取处却还不少，起码可以取“戒淫”必从“戒好色”开始。

不亲女色 丈夫身

252

劣性发时 似山倒

265

《水浒》描写焦挺等一干人物“劣性发时似山倒”，都是当作“侠义”英雄的“侠义”行为立意着墨的。其实除了顾大嫂那番冲口而出的话，其他人说的、做的，无一足堪归属“侠义”。梁山一百单八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歹人、坏人甚至于刑事惯犯并不太少，决非凡列名者均为“侠义”英雄，均有“侠义”精神，真“侠义”英雄的气质也不在同一档次、同一品位之上。

按照传统“忠义观”，狭义的“忠”主要指“事上”和“为公”，广义的“忠”则泛及于“为人”和“处友”。《水浒》里狭义的“忠”和广义的“忠”都与“侠义”相通而重合，居于核心价值地位的乃是广义的“忠”。而且“侠义”还包罗了“节义”、“勇义”和“仁义”，因之是“侠义”包罗“忠义”、涵盖“忠义”，这部小说尽可叫做《侠义水浒传》，不宜叫做《忠义水浒传》。

利害场中 忍便抛

280



《水浒》究竟是怎样一部书？自其成书四百多年来，广及江湖，高至庙堂，历朝历代都解读者众，迄今依然错杂纷陈。

在当今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水浒》评价，在于将它定位为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或者表现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就称它为“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重庆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中，《水浒传》的“前言”也说它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壮丽史诗”。再加上同名的电视连续剧推波助澜，这样的界定似乎成了不刊之论。

不过，仅止似乎而已，是否不刊尚待辨识。《水浒》的文本，无论是七十回本、七十一回本、百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都没有给这样的界定提出本文的充要支持。谓予不信，就请仔细读一读一百二十回本，看一看《水浒》到底怎么写那些书中人、那些书中事的。

《水浒》第一回，着力写了“洪太尉误走妖魔”。一个神道魔幻小故事，当作引发《水浒》故事的先导，预先交代了梁山一百单八将的身世根由和行为指向。借用龙虎山真人的话，他们本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被“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在“伏魔之殿”的“一个万丈深浅地穴”里面，“经八九代祖师”仍不敢把他们放出来。但命中注定，“遇洪而开”，奉旨上山请张天师进京“禳灾”的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在山上道众面前耍官威，硬是把他们放出来了。“刮喇喇一声响亮”过处，“只见

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那道黑气”是什么样的“黑气”？“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要去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水浒》的作者引而不发，只是经由龙虎山真人之口说出“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这句话，列在第二回开头，接下来还有一首七言诗：

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

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

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从话和诗中不难意会，“天罡地煞出泉台”以后，就“酿”成“祸胎”了，就“惹”出“灾”害了，就“必恼下方生灵”了。而这三个“就”集中示现为“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祸”与“灾”既“恼”及“生灵”，又“扰”及“社稷”，看来就是“天罡地煞”今后行为的基本指向。

这好像明白，却又不十分明白。“祸”与“灾”，“恼”与“扰”，尽管都具贬义，毕竟都属中性。这些中性词，并不足以判定“一百单八个魔君”所化成的梁山一百单八将今后的所作所为算不算农民革命或农民起义。

若要作出比较贴切的相应判断，就得先从一般的词义入手，弄清楚什么叫做“革命”，什么叫做“起义”，以及与之关联的什么叫做“造反”，什么叫做“落草”，什么叫做“剪径”。《辞源》比《现代汉语词典》更重古义，所以求解这些词，主要依据《辞源》，其次也参酌《现代汉语词典》，最好不以今范古。

什么叫做“革命”？《辞源》的解释为：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因称朝代更替为革命。《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晋书·王敦传》上疏：“昔汉祖以神武革命，开建帝业，继之以文帝之贤，纂承洪绪。”今谓政治、经济之大变革为革命。

什么叫做“起义”？《辞源》的解释为：仗义起兵。《宋书·殷琰传》：“时绥戎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玘起义于悬瓠，收兵得千余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武装革命，如秋收起义。有时指反动集团的武装力量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正义方面。

什么叫做“造反”？《辞源》无此义项。《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动。

什么叫做“落草”？《辞源》的解释为：旧时多称被压迫者逃往山林抗暴为落草。《五代史平话·梁》：“不向长安看花去，且来落草做英雄。”

什么叫做“剪径”？《辞源》的解释为：谓拦路抢劫。《水浒》四三：“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什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

很显然，这五个词依次在词义上存在着相关、相交、相连或者相近之处，但又决不相互等同。而且以“造反”为分界线，前两个词与后两个词相差甚大，通常难以相提并论，尤其不能等量齐观。置之梁山一百单八将，若干个人或某些群体都曾有过剪径行为，整体的上梁山也可以叫落草。关键就在于，他们落草于水泊梁山之后，整体性的行为指向只是停留在造反层面，还是进入了起义层面，甚而简直就是革命。

判别是不是革命，是不是起义，根本的标尺在于其行为的思想动机和行动纲领何所归依。举凡通读过《水浒》的人当会知道，水泊梁山在打出“替天行道”旗号以前，与桃花山、二龙山、清风山、少华山等山一样，基本的追求都在通过打家劫舍，攻城掠地，换取“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第十二回王伦语）或“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第四十四回戴宗语），求得“大家图个一世快活”（第十五回吴用语）罢了。如此境界，实属历代“且来落草做英雄”之人所为，算不上革命，也算不上起义。及至打出“替天行道”旗号以后，仿佛有了“仗义起兵”的意味，其实依旧并不然。且不论“替天”的那个“天”，依旧是“忠心报答赵官家”（第十九回阮小五歌）的那个“赵官家”，即北宋王朝的皇帝老倌儿，即便说“行道”，也并不是什么“酷吏赃官都杀尽”（同回阮小五歌），反而还做了一些献媚权奸（如第七十五回、第七十六回，特别是第八十回）、祸害民众（不少回目皆有例证）的事情。这就表明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实施变革以应天命”之意之志，也不是“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武装革命”，因而依旧算不上革命，也算不上起义。

那么，梁山一百单八将只是一群落草为寇的土匪强盗吗？如果简而单之、笼而统之通盘一抹黑，就未免太武断。在《水浒》书里，无论是打出“替天行道”旗号以前，还是打出“替天行道”旗号以后，他们终究还是与“赵官家”统治体系内的“官军”以及效忠于“赵官家”的土豪劣绅“民团”真刀真枪针锋相对地打过多次仗，对这多次仗不能不作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他们打的第一仗，是为救宋江。远赴江州劫法场，然后又顺势智取了无为军。一而二，二而一，起因都在宋江一人。当时的梁山“共是十七个头领”，包括晁盖在内，“带领小喽啰一百余人”去劫法场，为报宋江先前通风报信的恩义可谓不避风险。在法场上“四下里杀将起来”，尚未入伙的李逵“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杀人最多”。众头领跟着李逵，“当下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晁盖见状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



管伤人！”李逵仍然“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攻下无为军，“众好汉亦各动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及至喝令“那百姓休得向前”，“不干你百姓事，你们快回家躲避”时，滥杀无辜的过孽与劫法场一样已犯下了。但在另一面，劫法场，破城池，杀官员，毕竟也是对既成统治秩序一次正面冲击。

第二仗三打祝家庄，表面诱因在时迁偷鸡，深层动因却在“祝家庄那厮要给俺山寨敌对”，“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宋江领兵攻打祝家庄，一再失利后，终于靠孙立等人作为内应，取得成功。破庄之时混战中，除了杀死祝家父子、教师栾延玉以及庄丁等众人，还有不少庄客也跟着遭殃。李逵尤其“杀得手顺”，把已守中立的“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又“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宋江进而与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多亏石秀谏阻说：“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济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采纳后，除“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还“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正因此，梁山人马凯旋时，“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携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这就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梁山好汉虽有杀人放火、殃及无辜的强盗行径，但并不是悉皆赞成，正确的意见也能占上风；二、更重要的是，铲除祝家庄的土豪劣绅恶势力，大则冲撞了一下“赵官家”统治体系的社会基础，小则为“村中除害”，因而可以得到“村坊乡民”一定程度的拥护。

第三仗打高唐州，直接原因固然在于救柴进，所引发的政治意义却重大了，第一次与当时那个国家机器较上劲了。高唐州的“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马，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依仗他哥哥势力，在这里无所不为。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人尽称他做殷直阁。那厮年纪却小，又依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人人”。柴进家里有宋太祖钦赐的“丹书铁券”，尚且惨遭殷天锡、高廉之流欺侮迫害，寻常百姓更何待言？正因此，宋江率领梁山人马攻